

耀民编剧、在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的《本世纪最后的梦想》，还有后来的《爱情泡泡》。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后，我在上海排的戏基本上都是在上海这边了，如《1977》和《大清相国》。尤其是《1977》，我当年也参加了高考，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很多感受和经历搁在这部戏里了。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的感触很深。虽然我主要在北京工作，但我在北京排的戏，也会到上海来演出。这里不仅有国际演出，还有大量的国际合作的戏剧创作，包括戏剧学院里国际大师的讲课，以及我更看重的剧团里的国际合作。我很欣赏上海戏剧界的这种国际化。

从文工团演员到 中国第一个博士导演

《新民周刊》：您在成为导演前的经历十分丰富——1957年生于北京，在安徽长大，曾在安徽池州地区文工团当演员。那么，您当初为何会选择放弃安徽工学院机械系的录取而在一年后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这与您当庐剧演员及剧作家的父亲是否有关？

王晓鹰：虽然我父母都是戏剧界，但是再往上就没人吃这碗

饭了，所以我不算生于“戏剧世家”。

合肥古称庐州，所以安徽地方戏就叫“庐剧”。我的父亲是一名庐剧演员，后来改去写剧本了。我在北京出生，小时候一直住在北京的外婆家，并不在父母身边。

在我的记忆里，对于戏剧的最早印象是5岁时回安徽的一段经历。当时我看到家里挂着梅兰芳《贵妃醉酒》的彩色剧照，就问父亲“这是谁”，父亲说“这是一个演员”。然后我就说：“演员（眼圆）？是不是就是眼睛很圆的人？”这段对话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算是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

后来我去看父亲唱戏，在后台根本没认出一身装扮贴着胡子的他。父亲当着我的面把胡子一摘，做出一个逗孩子的表情，在我心里第一次建立起“一个现实的人”和“一个角色的人”之

我当时在合肥是少见的普通话标准的孩子，**因为来自北京，所以朗诵和报幕也都是我。**

下图：王晓鹰在池州文工团的武生造型。



间的一种转换。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就从北京回到合肥生活了。当时老看父亲演戏，天天看他排练，看其他演员练功。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要做这行，父母也没有打算一定要让我做这一行，但那就是在血液里面流的东西。

我小时候嗓子也好，经常参加文艺演出。我当时在合肥是少见的普通话标准的孩子，因为来自北京，所以朗诵和报幕也都是我。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安徽皖南山区的池州文工团，跳舞、唱歌、演戏、唱黄梅戏、说相声……什么都演。我父母当年也是文工团出身，所以他们给我的叮嘱是：有戏可演的时候，不管角色大小，都要认真演戏；如果没有演戏的机会，周边的工作能做尽量做，一专多能，什么都要会干才行。

刚工作那几年，我们文工团每年春天和冬天各一次要到深山老林的最深处去演出，扁担一头挑着演出的道具，一头挑着生活用品，为那里的人送去快乐。我记得大雪纷飞的第二天，当地人就在路口欢送我们，还说“你们明年再来吧”。当时我感觉在文工团待一辈子都没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好20岁。我中学时的理科成绩非常好，所以就报考了。当年是